

文学之路就是人生之路

□张者

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，是孤独的长路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踽踽独行。作家的文学之路就是人生之路，和现实生活密不可分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，是文学创作的缘起。生活是作家的记忆之根，文化之根，也是文学创作之根本。

现实生活当然不都是完美的，但是，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，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。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。

现在大家都在思考文学如何出圈，如何把文学推向社会，推动文学的跨界传播，扩大文学传播力和影响力，这是作家、编辑、文学期刊、出版社的一个重大课题。而作品能跨界传播需要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跨出文学界，还要跨出国界，走向世界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。增强文化自信，就是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，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

增强文化自信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，这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。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支撑着作家的自信。有了优秀的文学作品，才能增强传播力，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在全世界绽放出美丽的光芒。

□屈刚

“大地知晓一切。你一旦犯错，大地就会知道。”据说这是印第安人的谚语。

梁平人也深谙这个道理，千百年来都以对自然最虔诚的敬畏，小心地守护着这片膏腴之地。如今，她终于以亮眼的姿态，站上国际舞台，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入选的“国际湿地城市”。

在梁平，湿地是蜿蜒交错、奔腾流转的河流，是星罗棋布、林木辉映的湖岸，是清水浅流、阡陌横亘的稻田。400余个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小微湿地，让城市、汀岸、原野互相互照，人们傍“湿”筑舍，坐看云起，湖光山色径入家门。

双桂湖是这座湿地城市最具吸引力的生态之眼，湖泊、楼舍、森林、田园、溪流在此融为一体。智慧的人们引水入城，沿湖的赤牛溪、窝子溪和着梯塘、林泽在小区和楼栋蜿蜒相绕，形成空间连续、结构完整、功能完善的有机湿地网络，“蓝绿交织、城绿交融、田城相拥、水城相映”的城市湿地连绵体得以完美呈现。

上万只雁鸭类候鸟在这里越冬栖息，嬉戏啁啾声、翅膀扑腾声，把平静的湖面搅得波光微澜。如果你能多驻留一会，说不定就会遇见全世界也只有1000头的珍稀濒危水鸟青头潜鸭，那真是一种难得的邂逅。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苕菜在这里成片生长，春秋时节，黄色小花在长达几个月的肆意开放中，铺满了半个湖面，也把人们带入到梦幻之境。

行走在湖畔，有时会看到时空隧道里的某个景致，可能是正在桃林中缘溪而行的武陵人，也可能是瓦尔登湖畔小木屋里安静的梭罗，但反复比照，还是会醉心于身边这份触手可及的恬淡和静好。

□徐南鹏

中国人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茶放最后，不止有一种说法。

对有些人来说，茶并非必不可少，没喝过一口茶，也过一辈子，绝无憾意。也有人说，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说话讲韵律，凑七个字，讲七件事，加上茶是阳平，落在后面是必然。哪种说法，都有道理，都有人信。

我讲的，茶是缘。老同事让我给他讲茶，安排两个下午，我应了。把茶的分类、泡法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和历史串起来，讲了一个下午，本来想讲茶的趣事，没讲成，他也没听成。这都是缘分。他说我对茶有常人没有的敏感。我解释说，我来人间，吃的第一口是茶，不是奶。他以为我开玩笑，但事实如此。我出生在农村，是村里姑娘接生。南方农村煮一杯陈茶，喂给刚出生的小孩，其功用略同于北方给孩子喝黄连水，解痰清肺。

20多年前，刚到北京，我周边喝茶的人不少，但多是茉莉花茶，大盖碗，放一小块冰糖，浅浅的甜，像是当年多数国人所希望的生活味道。这是一种方式。真喝茶的，不是这喝法，是喝茶的韵。韵，是趣味，是人的加入，是情感的参与。

中国人把单纯的生活必需品说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文化，像东坡肉，吃的已经不是猪了，这是东方人独到的智慧。近年来，喝茶的人多了，风雅人也多了，懂茶不懂茶的人在一起总要聊上两嘴，好像不表达几句个人见解，不让人觉得自己爱茶懂茶，就上了台面似的。这过界了。但也不觉得有啥不妥。

懂不懂茶，在我看来，学不是关键，关键在喝。喝过好茶，自然懂什么茶好；没喝过，听别人讲得再多，想象和真相之间总是隔着一条河。

有人问我，三棵树怎样？三棵树是指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景区的大红袍母树，至今有三四百年历史。茶好，与茶生长环境大有关。武夷山在北纬28度左右，海拔600多米，正是茶的最佳生地。那里山静水美，不管哪个季节，人去了，都会产生安静泡在水里晒太阳的愿望，或者安静坐在山上吹风的冲动。

从自然主义角度看，武夷山峰陡峭、秀水回肠、风光胜美。“桂林山水甲天下，不如武夷一小丘”，不

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，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，讴歌时代的进步，跨出国界去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，去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，这是摆在我们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。

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讲好中国故事”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任务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作家就要聚精会神地、心无旁骛地去写作。塞林格曾经在晚年时提出“临终三问”：一问“你写时确实全神贯注了吗？”二问“你是写到呕心沥血了吗？”三问“你写下的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最想读的东西吗？”

中国作家要学习这种写作精神，锲而不舍地去探索，去挖掘。同时，文学作品的写作需要耐心，特别是小说创作，需要耐得住寂寞。帕慕克曾经说：“小说家则是借耐力来打拼，基本上是靠耐心，慢慢地，像蚂蚁一般地前行。小说家令人印象深刻，凭的不是那种疯魔而浪漫的眼光，而是他的耐心。”

中华文化重视自然，也重视自然中的人。注重“天人地”和谐共生，这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底色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，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。

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建设看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，这些美好愿景正在实现。我们的文学创作应当与之相匹配。

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，是以小见大的。茅盾先

生曾经说过，“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，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。”

面对绿水青山，我们可以从一片叶子开始，一叶显树，一树见林，一林能见山之黛色，就能让万山红遍，尽显金山银山。

海明威认为，“少年时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。”我是兵团人的后代，兵团人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屯垦戍边的。

《山前该有一棵树》讲述的是在花草踪迹难觅、杂石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中，将一棵茂密而孤独的胡杨树移植到学校的故事。老师带着孩子们去想象一棵树、寻找一棵树，挖树、移树、栽树，去滋养这棵树，因“树”而发生的一切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。《山前该有一棵树》这个“该”，从环境生发，又带着明亮的期望，成为一种向死而生的“精神信仰”，那种信仰就是胡杨精神。胡杨树是一棵寄寓美好生活之望，文化生命之喻，人生成长之轮的“树”。

当我动笔写这一棵树时，我才发现，我写的不仅仅是树，原来也是人，是兵团人。人和树在荒漠中最终扎下了根，成为屯垦戍边，维稳护边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。

让我们来到梦开始的地方，面向大漠胡杨，面对雪山草地，轻轻一跃，便是蓝天白云，万水千山。

（本文系作者于11月19日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，有删减。）

湿地之城

一边是乡野的牛啤蛙鸣，一边是城市的咖啡香溢，田园和现代共同起舞、互生互育。

所以，明代大儒来知德以“春深多燕雀，鸟也爱吾庐”来注解梁平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以“睡觉不知天早晚，数声牛笛下前坡”来体悟梁平人自在的生活。正是因为始终如一坚持对自然生态的守护，让我们从来都没有远离村庄，没有告别炊烟，城市和田野都是我们的故乡。

而最让人欣喜的，是住在城市的中央，依然能够拥有芳草，拥有露珠，拥有完好的自然。

“一山两水七分田”的梁平，在漫长的岁月雕刻中，不但保留了原生态的本真底色，更生长出时代化的独特气韵。尤其是80万亩稻田湿地就是一片块绚丽的调色板，铺展在“三山五岭”间，缀连在“两槽一坝”中，随四季变换在大地上泼彩作画。

“万石耕春”是最大的那片稻田湿地，在宋朝时就已具有响亮的名声，时任官员在高处建有“万石楼”，以备视察春播秋收。早在800年前，大诗人陆游途径梁平，便在瑞丰亭上欣赏到“万石耕春”中“渺渺郊原水初白”的冬水田园美景，发出“都梁之民独无苦，须晴得雨雨得雨”的无限感慨。清代诗人吴承礼也留下了“上下多如历级，往来人尽乐深耕。游踪最是清和候，坐听秧歌处处声”的佳句。

这广袤的田野，滋养出厚重灿烂的农耕文明，成就了梁平“巴蜀粮仓”的历史地位，更激发了“梁

山熟，川东足”的自我期许。可见，梁平先民们一直都在感念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生态资源，咏赞着这片土地赠与我们的丰盈和富庶。

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的人们，享受着“闲日编新篓，丰年补旧仓。客来一碗酒，豌豆煮肥肠”的闲适生活。傍晚的树荫下，搭起了凉床棍，搬出了矮茶几，蒲扇、烟斗、茶盅伴着俚言俗语，其乐融融。聊着聊着，就有人吼出了一声荒腔走板的调子，拍出了一串急乱无章的节奏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调子越吼越准，节奏越拍越稳，于是梁山灯戏开始登场了，癫子锣鼓、抬儿调调弄出阵势来了。

哦，原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把耕作的辛苦化成了一种惬意的享受，把对土地自然的挚爱凝成了一段灼热的历史。

捧回《湿地公约》缔约方大会颁发的证书，不禁想起诗人陆游写给梁平蟠龙瀑布的那句“古来贤达士，初亦愿躬耕。意气或感激，邂逅成功名”，梁平人民始终保持着朴素的躬耕之心，却又常怀邂逅功名的浪漫之情，终于在今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态业绩，走上了绿色发展的国际T台，亮出了令人惊艳的国际范式。

站在“国际湿地城市”的起点上，我们在回望、在铭记，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过去的故事；我们也在创造、在闪耀，期待在历史的沉淀中，求索、奋斗、奔跑，捧出一部关于未来的大美诗集。

遇见茶是缘分

要说茶，即便是人，生于斯长于斯，多点灵秀清明不足为奇。如果论科学，只能说这里土壤好，丹霞地貌乃亿万万年间的沉积岩风化所成，土层虽薄但富含矿物质；气候好，清冷冷的九曲溪穿行于山间，白天阳光猛烈，早晚云蒸雾罩，昼夜温差大，没有比这更高端的茶生长环境了。三棵树产的茶，乃人间稀有之物。

现今，世上已无三棵树。三棵树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，2005年5月3日最后一次采摘，得茶20克。2007年10月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别收藏仪式，由武夷山市政府把最后采摘的三棵树茶叶赠送给国家博物馆珍藏。

遇见大红袍，是趣事，是缘分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我上武夷山，主人雅兴，精心安排。一大早，我们先上了大王峰，看日出。主人要我写首武夷山的诗，回报是请我品大红袍。我欣然答应。

下山后，我们来到武夷宫。主人把四面窗户打开，微微晨风吹拂，桂花香迅速涌进，占领整个房间。待大家净手坐定，主人把滚烫的山泉水注入茶碗，奇迹瞬间发生，宽敞厅堂里竟然闻不到一丝桂花香！以桂花香之浓烈，在大红袍的霸气面前，如同小动物听闻山大王出场，瞬间跑得无影无踪。一时间，众静默，敬崇之情油然而生。

那时，我明白，为什么古人把武夷山所在地称作崇安、崇敬、安详呵！

茶，有气，而不只限于香。同我爱人谈茶气，她不解，为什么不用茶香？

我解释，茶香仅仅是香，不会有层次感；茶气不仅香，还有清，是茶同水结合后才有的层次，茶气维度高于茶香维度。

在屋里，我燃了根沉香，香气袅袅逐渐弥漫开。我说，这是香。爱人说，很香。我说，你先出去，一会叫你。她出房间后，我泡上水仙，倒在茶杯里。白瓷茶杯中，茶水浅黄而清亮，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脂般的气，缓缓浮现、移动、飘散。我说，来吧。爱人走到房间门口，我让她站住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她说闻到茶香了，沉香没有了，茶

香像一支箭。我喜欢这个箭字，穿透力极强。当然，我说，茶的清香，可以是容器，也可以是一面墙，消融或者阻隔其他的香味，包括沉香，正如场的存在。

茶的气，要有水才能完成，好茶得有好水。早些年，参加过北京马连道一次茶会，一群茶达人品茶评茶。

普洱、单丛、老白茶，一圈下来，喝得开心，说的高兴，听的也津津有味。快散场时，主持人见缩在角落里的我没说话，客气一下，问我，你是哪家的，也说说？我本不想说，但朋友已把我从座位上推起来，只能礼貌地向大家举了举茶杯，说，大家讲茶讲得好，我没什么可讲的，只是这水，有来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主持人把放下的杯子又端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说，敬你，你是第一个讲到水的。然后，他拉着我，把他边上一个座位腾给我。

他告诉大家，这水是北京城东南60公里外的一口井里取的，这口老井，他找了三年多。水之于茶，是引信，也是载体。好茶遇见好水，才懂得和解和珍惜；好水宠溺好茶，如我们回归自然天性的一份渴求。

茶是中国的文化，也是中国的人生。需要高的时候，茶高得上去，高成国家层面的礼仪。瓷和茶，都是中国人的发明，最终奉献给世界，推高人类文明。这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自信。

需要低的时候，茶低得下来，低成一个人的生活和情趣。诗人、评论家霍俊明喝过我泡的茶，大概率味觉被锁定了，他欣赏我的一首诗，“白瓷的杯盏/放下时，叩木桌发出轻响”（《茶经》）。他说，我喜欢这一声静夜中的“轻响”，这是一次无意的提醒，也是无端的自明。提醒和自明，是茶自带的，也是人所追求的。

立冬日，千里之外的朋友发来张图片，一杯茶，随后是两字：甚念。看那茶汤色浓醇透亮，茶气饱满，非宋聘不可能有。

隔着手机屏幕，我似乎闻到了老茶独有的香气。我复：缘分，珍惜。

□杨耀健

10月底，《春之序曲——吴凡美术作品与文献展》在重庆美术馆举行。我慕名前往。

展馆内有关于吴凡的简介，他是重庆人，生于1923年，1948年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。1950年在重庆市文联编辑部工作，1956年调美协四川分会工作，曾任中国美协理事、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。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。

展览以《春之序曲》为名，提示了它的内涵。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，是播种的季节，是阳性的季节，古人曾用许多优美的诗句歌颂春天。它是孟浩然笔下的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是韩愈笔下的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是贺知章笔下的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是苏轼笔下的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

吴凡笔下的春天，是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春天。1956年，吴凡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套色木刻作品《布谷鸟叫了》。画面以青年女拖拉机手为对象，描绘了在布谷鸟的叫声中，人们即将开始春耕的劳动场面。

《布谷鸟叫了》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对农村生活的再现，而是从平凡的劳动中发掘恬淡纯朴的诗意。他以木刻的简约明快，加以色调的奇幻夺目，拓展了套色木刻的表现力与包容性。

创作于1958年的《炊事员》，以人民公社食堂的年轻炊事员为主人公，她在做完开饭准备后，还周到地准备了茶水，迎接社员。她的肩头搭着白毛巾，脸上带着甜美的微笑，胸有成竹地预测社员们一定会满意她的手艺。

创作于1959年的版画作品《蒲公英》，是吴凡的成名作。画面中一位跪坐的女孩，手持蒲公英，昂首鼓起小嘴，轻轻吹动，像小伞一样的绒毛便轻盈地飘向天空，飘向四面八方。作品造型纯朴，构图简洁，意境深远，抒情味极浓，荣获波兰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二等奖、德国莱比锡国际版画比赛金奖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1961年上半年，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出版在即，中国青年出版社请重庆方面提供插图。当时居住在化龙桥的吴凡、李焕民、宋广训等8位四川版画艺术家，共同组成了《红岩》插图版画组。按分工，吴凡承接了其中两幅，分别表现江姐在城楼凭吊和就义前的情节。他采用了传统的黑白木刻，强化黑白效果，构图大

春天的歌唱者

——观《吴凡美术作品与文献展》

块分割，刀法以粗犷为主。城楼凭吊是《红岩》感人的高潮。江姐奉命去下川东开展工作，原本怀着与久别的丈夫重逢的企盼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丈夫血淋淋的头颅，竟然被反动派悬挂在城楼示众。一朝永诀，悲痛欲绝，细雨纷飞。江姐强忍悲痛，走向复仇的战斗。丈夫牺牲了，这个任务应该由她来继续。

就义前的江姐，头上翻滚着乌云，眼前横亘着鬼城，敌人即将向她举起屠刀。然而，她怀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从容整装。她用最坚定的方式，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气节。

这两幅作品，表现的是革命者对民主革命春天的执着信念与追求。《红岩》版画插图被誉为“中国版画史上最重要的杰作”，吴凡的两幅作品，与其它插图珠联璧合，交相辉映。

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，人们沐浴在更加璀璨的春光里，火热的生活，使吴凡的作品内容日趋丰富。他1979年创作的《早春》，画面上虽然只有一盆搁在窗台的花卉，却别具匠心，将花卉画成含苞欲放的样子，寓意着未来会越来越美好。

吴凡的版画《谷雨时节》，国画《春之序曲》《柳塘》等作品，也莫不以春天为主题，展示人们的生活热望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版画《沙漠树田》《早春》《葡萄》《无边春雨》等，进一步抒发了他的火热情怀。

吴凡的中国画，得到他的老师李苦禅的真传，使人感到朴素天真，苍劲健美，具有深切感人的艺术魅力。他在古都北平求学时，就对中国画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见解，并一直贯穿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。

这次展览展出的中国画，无论是人物还是山水，都显示出吴凡扎实的功底，注重中国画“传神于意，形神兼备”的美学原则。早年的孜孜不倦，刻苦临摹，成就了吴凡后来的硕果。他的书法作品，当然也流露出碑帖的气息。

我喜欢吴凡刻画的平凡劳动者，人民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，普通人物的形象，鲜活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他曾说过：“这些人不处于生活斗争的最尖端，故不轰轰烈烈；太多了，故显得平凡；也许还蒙蔽着一些缺点的灰尘，故不那么光辉夺目；然而，他们却有着与时代精神相通的一面。”

的确，《布谷鸟叫了》《炊事员》《小站》中那些穿着素衣的女子，虽不惊艳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淳朴之美，寄托了人生的美好理想，犹如春风拂面。



多彩大巴山

许可 摄/视觉重庆



投稿邮箱: kjwtzx@163.com